
日据时期的蒙疆烟祸

农伟雄

本文论及的蒙疆,包括今河北之张家口地区,山西大同以北,内蒙包头以东和东北三省交接的广大地区。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的西进兵团,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便分别占领了张家口、大同以及包头和厚和(即呼和浩特),并以张家口为中心,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后改为蒙疆联合政府)。从此统治中国这一广大地域达8年之久。

这一地区总面积约51万平方公里,土壤气候适宜种植粟罌(即鸦片)。所以,很快被日本的侵华机构兴亚院指定为罌粟种植和毒品生产基地,成为日本在中国进行鸦片侵略的策源地。

如同三光政策,七三一部队、南京大屠杀等罪行一样,鸦片毒品也是日本入侵者残害我中华民族的残忍手段之一。其所造成的灾祸实属罕见,本文试将蒙疆地区的烟祸披露如下。

一 蒙疆傀儡政权最初的鸦片税收

七七事变之后,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所指挥的察哈尔西进兵团,于1937年8月初,分三路攻击中国驻军,8月26日占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9月4日建立七七事变后第一个傀儡政权——以日本人竹内为最高顾问,张家口商会会长杜运宇和于品卿为正、副主席的“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晋北重镇大同,9月15日,又成立以日本人前岛升为最高顾问,清末举人

夏恭为主席的“晋北自治政府”。10月14日和17日,日军分别占领包头市和厚和市,28日又成立了以日本人竽山兵士为最高顾问,内蒙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的“蒙古联盟政府”。11月22日,关东军在张家口召集以上3个傀儡政府会议,正式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正式成立“蒙疆联合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日,即致电关东军司令官并达成密约:“凡联合委员会所有之命令及一切政务之执行,根据日军之需要,由日军及日满(即伪满洲国)两方予充分协调。”结果,由日本派出金井章次首任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长及最高顾问,掌握了傀儡联合机构的决策权。三地区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蒙疆地区历来是罂粟种植和西北毒品转运必经之地。制定鸦片政策,牟取暴利,开辟财源,以扶植傀儡政权,这是入侵者的重大决策之一。1937年10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一、“蒙古联盟政府应尽力促其早日成立”;二、“在确立鸦片、盐务政策时,应特别注重筹划财源”。由此可知日本对蒙疆鸦片种植之关切程度。

收取种植税或过境鸦片税,历来是中国三地区当局财政上主要来源之一。直到1936年,察哈尔省财政收入之三分之一仍来源于此。对此日本了如指掌。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之后第10天,即1937年12月1日,便颁布了《鸦片业务指导纲要》。这是日伪蒙疆政权第一个关于鸦片政策的文件。

笔者至今未见到《指导纲要》全文。但从各种散见的资料中知道,在蒙疆个别地区实行指定种植罂粟的计划和全面推行鸦片经营的“许可证”制度,当是对《指导纲要》的执行。这些资料反映出,《指导纲要》规定政府不直接参加经营鸦片,而由各级自治政府所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无版权页,北京图书馆藏。

李海清:《察哈尔纪事》,《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3辑,第151页。

同上,第153页。

属的鸦片公会负责执行。所谓“许可证”制度其目的是为尽可能掌握经营者,以便政府尽可能征取鸦片经营税。

在《纲要》的指导之下,1938 蒙疆政权从甘肃、宁夏等地大批调运优质罂粟种籽,计划播植 25 万亩;随之各级鸦片公会也纷纷成立。这些公会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当地的贩烟大户,由他们负担组织鸦片公会,而日伪政权充当后盾。1938 年,张北周围 6 县,出现了 8 个分会,先后建立烟馆 35 家。大同、厚和等情况类似。

七七事变前,张家口市主要经营来自宁夏、甘肃等地的“西口烟”和来自绥远赤峰、丰镇一带的“口外烟”;主要销往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留在本地销售的不足 100 万两。伪蒙疆联合政府成立之后,西口烟的来路受中国驻军的拦截,到达大同以至张家口的数量少了,但 1938 年仍在 500 万两左右。这是由于日伪的《指导纲要》对鸦片经营采取鼓励政策和各级鸦片公会组织协调的结果。当年张家口的“察南自治政府”沿用中国察哈尔省 1936 年的税表,征收各种鸦片税收。至 1938 年 9 月,征收的鸦片税额达 116 万元。而七七事变前 1 年,察哈尔全省的鸦片税额只有 110 万元

以下是察南傀儡政权 1938 年度使用的征收鸦片税表:

鸦片税收表(单位:元)

税种	征收对象	金额
印花税	管内销售之鸦片	1 两 0.15
入境税	由陆路运进的在管内销售之鸦片	1 两 0.02
出境税	自管内运往平津之鸦片	1 两 0.02
过境税	由铁路运往平津之鸦片(通过管内)	1 两 0.08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 23 辑,第 153 页。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

(日)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 86 期,第 251、253 页。

同上,第 251 页。

烟土牌照	烟土营业税, 分 3 等	每月: 40—80
烟膏牌照	烟膏营业税, 分 4 等	每月: 60—120

根据蒙疆新闻社编的《六年来之蒙疆》的资料, 实际上日伪所征收的鸦片税项, 还有“烟具牌照税”一项。资料表明, 当时的烟具商店实际上就是烟馆, 除了销售各种烟具, 有的还设铺位招揽瘾君子。烟具税收的金额分三等, 按租用时间或销售征税。

晋北傀儡政权建立之后, 便在大同市李怀角南街建立“鸦片公会总会”, 不久便有 6 家分会; 同时建立的烟土店有华昌、大北、公益、索宝丰、振大号、大东亚、南冠等 20 多家。这些烟馆专门经营“口外烟”。由于晋北伪政权就在山西省境, 因而鸦片税收流失很大。据当时山西省政府人员称: 绥远各地烟贩每天都越过管界, 进入省境, 走私鸦片进入山西如潮水般涌来。山西省设立的一个缉私点, 一个月便征得 10 万元以上的税收。1938 年, 晋北伪政权只征得 15 万元的鸦片税款, 流失到阎锡山政府去的约有 70%, 为三区中鸦片税最少的地区。

蒙古联盟所属之绥远地区, 是传统种植罂粟的地方。辛亥革命胜利之后, 民国的《临时约法》曾宣告严禁种植, 当地也曾制定相应的法规, 对种植者进行惩罚。但自 1918 年蔡成勋担任绥远都统后, 为解决巨大的军费来源, 复下令种植。1928 年又被南京政府严令禁止(但实际上是势所不及禁而不止)。这块“风水宝地”落入日本入侵者之手后, 便首先被指定为种植区。这是《指导纲要》唯一指定的罂粟种植区。1938 年指定种植面积为 34000 亩。当年收缴烟土情况没有公布资料。但伪蒙古联盟政权 1938 年全年财政预算额为 930 万元, 鸦片税收额为 256 万元, 占整个税收总额 27% (1936 年

《大同文史资料》第 3 辑, 第 9 页。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 蒙疆新闻社编。

占 13%)。

《指导纲要》鼓励鸦片毒品的自由贸易,因而其价格也是随行就市,自由浮动。1937年,张家口市的鸦片每两在2—2.30元之间,由于1938年旱、涝灾害所致,加上西口烟来路不畅,因而最高价有时竟达6—7元。而一向由张家口过境供应鸦片的北平、天津烟市,其价位每两竟在9—12元之间。据资料统计:尽管过境鸦片和当地种植收成并不遂愿,1938年一年伪蒙疆政权的鸦片输出量仍为9854779两,计43821175元,平均每两4.45元,鸦片输出占外贸的41%。其中输向平津有8908040两。而在七七事变前,这一地区每年输往平、津地区的约700万两左右。

日伪政权从鸦片毒品自由贸易中获取惊人的暴利,保证了1938年度财政对扩大侵略战争的支持。这也便是《鸦片指导纲要》所追求的目的。

二 兴亚院指导下的鸦片清查署

在日本不断扩大对华入侵的形势之下,作为指导侵略的决策机构,1938年12月16日,兴亚院总部在东京成立。兴亚院由日本首相担任总裁,外相、藏相、陆、海军总长分任副总裁。总部之下分设政务、经济、文化、技术等4部。作为总部的派出机构,1939年3月,相应成立了华北、蒙疆、华中、厦门等4个联络部和山东青岛办事处。蒙疆联络部总部设于张家口,据该部文件称:从1939年(昭和14年)起,每年在兴亚院总部,召开有关中国鸦片问题的供需会议,以决定每年鸦片的种植和供需事项。由此看出,规划中国的毒品种植和生产,对中国进一步实行鸦片侵略,是兴亚院的一项基

(日)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近代史资料》总86期,第256页。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3辑,第162页。

(日)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近代史资料》总86期,第256页。

本政策。

随着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的成立,蒙疆政府新的鸦片政策出台了。1939年4—5月间,先是从伪满洲国派出专业人员30多人来到张家口,帮助策划成立伪政府的鸦片专卖机构。兴亚院总部,则于6月15日派出仙台税务总局关税部部长大平正芳前来蒙疆指导鸦片工作。大平行前,兴亚院负责人之一、日本大藏相次官指示他说:你到那里去工作,你就是那里(即蒙疆)的大藏大臣。大平经东京、汉城、平壤、沈阳、北平,于6月20日抵达张家口,正式就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课长。大平到任后的第10天,即1939年7月1日,日伪蒙疆政权便宣布实行新的鸦片政策,即实行由各级傀儡政权直接指导的鸦片种植和经营的专卖制,各级政府成立鸦片清查署,取代各级鸦片公会。伪政府开始指导鸦片的种植、经营、购食等全部活动。

清查总署作为日伪政权主管鸦片毒品活动的总指导机构,之下设立张家口、大同、厚和3个地方清查署,地方局之下又各设5个清查分局,各分局之下是县、乡的烟政股,它们制定具体政策和制定种植、经营计划。在清查局的的指导下,又成立经营机构——蒙疆土药(业)有限总公司(1941年改为土业组合总公司),并相应地在张家口、大同、厚和设立地方分公司,各地方公司之下又分设11个分公司。这些机构无论是清查署还是经济实体公司的负责人,一般正职由中国人担任,而由担任副职的日本人掌握实权。

鼓励种植是新的鸦片政策的重点。日伪政权采取政府指定种植计划和广泛鼓励相结合的方针。据当地年长居民披露,为鼓励种植,三地伪政权都分别出安民告示。包头市政府的一则布告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第815页。

大平正芳著,辛华译:《我的履历书》,北京出版社1973年版,第11页。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布告

为布告事,查播种鸦片是增加国家税收,保障建设的资源,繁荣经济,活跃市场的枢纽。在医疗上是不可能缺少的特效药材。更是人民发财致富的捷径。望我广大农民大量播种,以期达到利国裕民之目的。特颁布种植条例如下:

一、凡居民人等,不分民族,畛域都有种植权利,所播种烟苗,政府决于大力支持和保护,任何人不得故意践踏或损坏,使收割顺利完成,保证人民的合法利益。

二、烟苗成熟时期,应由烟政负责人员会同乡保公所进行勘查丈量,不得以多报少,以丈量亩数缴纳税收(成品)。由土业组合负责收购。其给定纳证,以资证明。

三、烟苗割完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交清税收,不得借故不交或抗拒不交。如遭受天灾、冰雹之害收获欠佳时,可视情况酌情减少,但不得捏造虚报。

四、在收割时期,防止不法分子乘机偷割及故意滋事者。一经查实,定严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布。

市长 金朝文

各地都有不少农民受到蛊惑,为了“发财致富”,变卖家财也设法租田种烟(当时水浇地租金10—50元不等)。包头有的农户种二三十亩,全市播种面积达5700余亩。萨拉齐县水浇地多,多者种植四五十亩的。全县播种7600余亩。

在广发文告号召种植的同时,清查局还下达指定种植任务。1938年《鸦片指导纲要》公布时,只指定厚和一地为种植区。实行新的政策的当年,伪蒙疆鸦片清查总署向张家口、大同、厚和都下达了指定种植任务:

《东河文史》第3辑,第47页。

《东河文史》第3辑,第47页。

蒙疆罂粟种植指定区域与生产、预缴量统计(1939 年度)

地区	指定种植亩数	预计收获量(两)	预计收缴量(两)
张家口署	10000	200000	75000
大同署	155000	3100000	1163000
厚和署	846000	16920000	6345000
计	1011000	20220000	7563000

进入 1940 年,对三地区的指令性种植大幅增长:

蒙疆地区罂粟种植统计(1940 年度)

地 区	指定种植亩数	完成种植状况
张家口署	80000	85000
大同署	200000	200000
厚和署	950000	982000
计	1230000	1265000

1939 年度指定种植总面积;三地区共 1011000 亩,1940 度为 1230000 亩,一年内扩大 129000 亩,若与 1940 年度实际完成的种植面积比,则扩大 254000 亩。此外各地区民间为追逐利润的种植还不包括在内。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扩大种植后的收缴量,从官方统计上看并不理想。第一年(即 1939 年度)预计收缴量为 7563000 两,而实际上只完成 887018.6 两,只完成预计收缴的 11.7%。下表是 1939 年度指定的预计收缴和实缴量统计:

(日)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近代史资料》总 86 期,第 257 页。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江口圭一前引文。

1939 年度鸦片预缴与实缴统计

地 区	预缴量(两)	实缴量(两)
张家口署	75000	265280.5
大同署	1163000	170432.8
厚和署	6345000	451306.5
总计	7563000	887018.6

1940 年三地的收缴情况比上年好,但大同与厚和两地仍未完成预缴量:

1940 年度鸦片预缴与实缴统计

地 区	预缴量(两)	实缴量(两)	完成比例%
张家口署	600000	610230.2	101.7
大同署	1490000	1020000.1	68.4
厚和署	7125000	5034003.8	71
计	9215000	6664234.1	72.3

上述两表统计表明,张家口署两年中都超额完成了预计收缴量。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张家口是蒙疆日伪政权的中心,自然是日伪严密控制之地区,鸦片走私,还有各级工作人员从中渔利也较为不易。而大同与厚和两地则不一样。山西阎锡山地方政府早和绥远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由山西提供督察,控制绥远的产烟区,控制了鸦片收入的三分之二。虽然两地此时均已建立伪政权,但种植者宁可通过山西地方政府走私鸦片牟取暴利。此外,两地伪政府收购人员对烟农等收缴极其严重。厚和地区下乡收缴时,从扣烟农

江口圭一前引文。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入手,将产品分为8等收缴:1等每两2.50元,2等2元,3等1.80元,4等1.60元,5等1.20元,6等1元,7等0.98元,8等0.6元。此外还有等外品,每两0.2元。为使烟土能获得高等级,烟农须对收购人员请客送礼,否则便遭到低等收购。为避免损失,烟农只有想方设法,或是私自卖给下乡收购的烟贩子(此时常有烟贩子下乡高价收购),或是自己冒险走私。另外,1939和1940年收割时出现天灾,也是没有完成收购指标的客观原因。

土业公司从烟农那里压等收购,在市场上却高价出售。1939—1940年,张家口市清查署对吸食者限价供应只占吸食量的三分之一,每两在4.5—5元之间,超过限量则每两6—7.5元。远销平、津的蒙疆烟土,1939年最高两价在15—17元之间,到1940年达20—22元之间,上海、南京则更高。这样,蒙疆政权便将大部鸦片抛售平、津、沪一带,1939年获鸦片纯利润876万元,1940年增至1089.50万元。

三 太平洋战争后蒙疆烟祸加剧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鸦片作为一种侵略“武器”,随着侵略战争扩大而泛滥。1942年8月,兴亚院在东京总部召开“支那鸦片供需会议”,“紧急研究中国占领区的鸦片供需问题”。会后又由企划厅召集“大东亚鸦片制度‘恳谈会’”,探讨“大东亚鸦片供需的制度化”。结果两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建立以蒙疆和满洲两地为中心的鸦片生产基地,以供应中国和中国之外占领区的需供。”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古海忠之证实:会议决定在张家口(即蒙疆)和伪满地区扩大种植,负责鸦片需供之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829页。

需。

东京兴亚院鸦片需供会议决定的政策,很快在蒙疆和伪满区两地得到贯彻执行。1950年1月,在押的曾任伪满吉林省长金名世回忆说:1943年1月,我正在吉林省长任内,当时我接到“中央政府”的秘密指令,根据兴亚院会议的决定,伪满和蒙疆在原有基础上,扩大鸦片种植区域和亩数。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1934年10月,日本也曾在东京召集了一次有关中国鸦片种植问题会议,宣布在伪满洲实行鸦片专卖法,并决定中国的热河(今承德地区)为鸦片种植区,负责日本在中国及亚洲的鸦片需供。这次兴亚院的东京鸦片会议,对伪满洲国的要求是,除原有的热河种植区之外,另辟奉天、吉林、四平三省为新的种植区。下表是“满州国”在东京会议之后的种植统计:

1942—1945年吉林、奉天、四平三省
罂粟种植统计(单位:陌,1陌=15市亩)

年代	省份	种植面积	年代	省份	种植面积
1942	奉天	500	1944	奉天	1000
	吉林	500		吉林	1000
	四平	300		四平	700
1943	奉天	700	1945	奉天	1500
	吉林	700		吉林	1500
	四平	500		四平	1000

《六年来之蒙疆》一书,对该地区执行东京兴亚院鸦片会议有详细记述。在蒙疆扩大种植事项由蒙疆联合政府经济部和兴亚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829页。

《承德文史》第3辑,第61页。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829页。

蒙疆联络部经济课共同负责。经济部次长诏野曾召集会议，督导落实。扩大种植统计如下表：

蒙疆三地区罌粟种植统计
(1942—1944 年)

地区	年代	种植(万亩)	总计(万亩)
张家口署	1942	15.2	67.5
	1943	21.5	
	1944	30.8	
大同署	1942	29.5	100.6
	31.8	1943	
厚和署	1944	39.3	274.5
	1942	89.5	
	1943	91.2	
	1944	93.8	

上述两表的统计，伪满洲国尚缺热河的数字，但新辟三地奉天、吉林、四平逐年扩大种植面积，同蒙疆三地相比，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1942年一年，伪满三地种植1300陌，共19500亩，而蒙疆仅张家口署便有152000亩之多，若加上大同和厚和，当年三地扩种达1342000亩。这说明，此时的蒙疆，已经成为日本在中国最大的罌粟种植区域。

至于说兴亚院何以选择了蒙疆作为种植基地？《六年来之蒙疆》一书中，蒙疆新闻记者樱子分析说：一、这里气候、土质普遍适宜于罌粟的种植；二、蒙疆东北和满洲毗连，南靠平津，是西北、东北通往华北、华中的要冲，便于毒品的运输保护和销售；三、鸦

《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片是一种特殊战略武器,须借助于各种政治势力保护,而这里有国、共、伪三种势力鼎存,广大乡村管辖经常发生变动,有利于种植者匿名。

为扩大蒙疆的鸦片种植规模,日本除从“满洲”转运了大量的罂粟种籽和派遣专门的育苗技师之外,还制定了各种奖励办法。如张家口署规定,农户必须拿出四分之一的好地来种植鸦片,按规定完成种植者,可免除当年的土地税;种植超过5亩者,免除土地税和兵役;超过20亩者,可获县政府奖励,并可兼获前三项奖励;超过50亩者,可当乡县头面人物,同时获前几项奖励;而未完成规定任务者,要遭惩罚。各级伪政府要员还亲自下乡宣传。察南自治政府主席于品卿3次去怀安,鼓励村民们“为大东亚共荣多种罂粟”。结果1942年种植达5.6万亩。张家口近郊的万全县1944年全县种植5万余亩,涉及104个自然村,2300户。大户一种就是20—30亩。察南各地历史上没有种植罂粟的习惯,这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罂粟之乡。

蒙疆地区生产的大量烟土,加工成海洛因后(张家口有专门工厂加工,下节专述),通过宏济善堂这个机构销往中国各占领区及更远的地方。“日方对于宏济善堂运销蒙疆烟土之业务,系由兴亚院负责监督,每年该堂运销烟土的数量,由兴亚院核定”。宏济善堂是由日本浪人里见甫于1915年在关东州(即大连)建立的。此人在七七事变前,已在东北进行了20多年的鸦片贸易。七七事变后又随日军进入南京。1940年,他利用和当时的南京维新政府中日军最高顾问原田中将和日军上海特务机关关南本中将的特殊关系,拉拢中国富商盛文颐(盛宣怀之子),在南京设宏济善堂总部,并在维新政府注册登记,然后又在合肥、杭州、福州、武汉、广州等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2辑,第224页。

《审判汪伪汉奸记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48—1049页。

中心城市设立分号,公开进行鸦片毒品交易。“维新政府所设之戒烟局,名义上为宏济善堂之监督机关,实际上除按月照收少数之捐税外,一切不得过问。各地土商(即烟土商),悉听命于宏济善堂”。据当时维新政府内政部次长通过调查所掌握的材料,兴亚院历年核准宏济善堂经销的蒙疆鸦片(还有少量来自“满洲”)的数量为:1940年500余万两,1941年450万两,1942年350万两,1943年300万两。后由于宏济善堂供给东条英机巨额“机密费”,于1943年受到日本国内反对派攻击。国会议员中亦有人指责在华日军参与贩运烟土(例如日海军向宏济善堂购买大量烟土运往广东、海南岛等地销售),由此引发了南京学生的“清毒运动”。因此兴亚院命令里见甫和盛文颐停止活动,其所经营的宏济善堂也渐销声匿迹。

宏济善堂是蒙疆鸦片进入南方的主要渠道。北平、天津地区所需的大量毒品,则通过日伪蒙疆各级土业组合进行。“北京的鸦片主要供应者是蒙疆的土业组合,它接受蒙疆傀儡政权的管理,而由日军鼓励种植鸦片而组织的”。

此外,蒙疆鸦片还有大量储备用于军事的急需。在张家口,设有专门储备鸦片(烟土)仓库两座:即“长冈”和“荒井”仓库,存量均在50万两以上。仓库由日本驻蒙军长年严密守卫,这些库存的鸦片,大都是直接军需品,服务于侵略战争的。1942年李守信的蒙古军要购买20门火炮,张家口驻蒙军司令部一次拨给他15万两烟土。李派人去天津换成黄金,再转上海换取火炮。1945年初,驻蒙军又拨下11万两,李守信派人换黄金后购买枪械。日本宣布投降时,驻蒙军司令部又拨给德王和李守信各15万两烟土,后来两人逃往北平,又转中蒙边界,用这笔烟土费组织武装暴乱,继

《审判汪伪汉奸记录》,第1048—1049页。

(日)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近代史资料》总86期,第228页。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续与人民为敌。“八一五”以后日本紧急从张家口撤退，来不及处理“长冈”和“荒井”仓库的毒品。但在1945年初，驻蒙军运走了约20万两库存的烟土，并从天津运回日本国内。其余于8月26日被当地的瘾君子哄抢，损失在40—50万两以上，造成了严重恶果。

四 烟毒弥漫的蒙疆社会

日本对中国推行的鸦片侵略政策，始于甲午战后在台湾推行的鸦片专卖法，结果使日本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从此日本占领中国一个地区便在当地推行专卖法。1931年占领东北并扶植了伪满洲国之后即向东北推广。在蒙疆地区，自1935年占领了察北和察东6县后，便引进“满洲经验”。这也便是日本制造蒙疆烟祸的开始。

自1937年12月公布《鸦片业务指导纲要》到1939年7月推行新的鸦片政策的两年时间内，蒙疆超过了伪满洲，成为日本在中国，乃至于在亚洲最大的鸦片种植基地。“从呼市到包头一线，于五、六两月的时候，沿途大烟花盛开，分红、白、紫、粉四色……一望无际，形成罌粟花世界，很少看到粮食作物”。这种罌粟风景线，大同、张家口地区到处可见。

广泛种植鸦片制造了罪恶的“烟土文化”。烟土成为“黑金子”而受民间崇拜，卖买交易，婚丧嫁聚，探亲访友，以至于日伪工厂、单位的月薪，一切都有烟土的参与。种毒、制毒、贩毒、吸毒成为时尚被追逐。蒙疆社会终于沦为烟毒弥漫的王国。

鼓励种植为制毒、贩毒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收割季节一到，各级烟政人员（即土业组合人员）鱼贯下乡收缴“官烟”。他们从烟农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2辑，第216页。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2辑，第216页。

那里收缴到罂粟浆液或晒干的烟土块后,即送往成品加工厂,加工成为易于吸食的海洛因。1936年,日人坂田盛诚在张家口开设第一家坂田组合机构,专门加工察东6县的烟土。七七事变后,随着鸦片专卖法在蒙疆的全面推行,这个坂田组合便成为日伪清查署下属的鸦片加工厂。最初有10万美元资金,职工近200人,日加工烟土20大包(每包1440两),这是张家口最大的鸦片毒品制作厂家。

此外乡间还遍布各类烟土加工厂,多为当地走私者私自开设的“白粉作坊”。至于自家熬煮的“烟锅”更是无法计算,据张北县85岁的李石山老汉回忆:这种小烟锅几乎家家熬煮,都是自己留下防病治病用的少量烟土。对此村民们互相保护,对烟政人员绝对不能告诉。

贩烟纳吸的烟馆到处可见。以张家口署为例,日伪在坝上一带开设了55家烟馆,全由日本人经营;张北县张北镇有烟馆10处;张家口市内,40年代初期有烟馆30多家。在厚和署的包头市,除日伪蒙疆土业组合外,当地大商号如广丰厚、双顺裕、广生厚等十多家,也领有“许可证”,经营收购、运销烟土业务。大商号以外,在财神庙、丁香巷、平康里、东门、南门、圪料街、中市街、东市街共有烟馆31家之多。大同的日伪政权督促各烟馆增加床位和烟具设备,烟馆以鼓楼西为中心,多为私人集资经营。这些公开挂牌的大小烟馆,鸦片都从各级土业组合进货,定量供应烟土,定量以外高价零售。至于各处不经清查署批准的“黑户”,一经发现,只稍行贿就能继续开业。

鸦片走私极其猖狂。这种走私一是上层人物同日本驻蒙军狼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6辑,第352页。

1997年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6辑,第352—353页。

《东河文史》第3辑,第51页。

《大同文史资料》第3辑,第8页。

狈为奸进行的。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便是其中之一。李守信自供：“我从1938年投靠关东军之后，就在热河一带走私鸦片。七七事变之后，张家口和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对我和地方商人倒卖烟土不予限制。”在归绥，我和当地大烟土商贺东温及东北大土商张玉轩搭股，走私烟土到北平、天津牟利。”“我从一个‘土匪杆子’呼啦啦地聚集几千人的队伍，后又坐稳蒙古军总司令的位子，全靠走私鸦片给弟兄们占‘小恩小惠’”。至于日本侵华日军的海军通过宏济善堂走私鸦片的事实上节已经论及。

各地民间的烟贩子更是难于计数。每到割包季节，他们抢在日伪清查署之前下乡，高价抢购烟土。为逃避日伪清查署的检查，采用的办法无奇不有。1940年，察南烟贩李××以“送葬”出殡为由，“灵柩”内藏5万两烟土直送北平。有的烟贩子雇用“坐队”走私，坐者将“白粉”藏入肛门或阴道内，男坐7（两），女坐1（斤），坐者沿途不准进食，到达目的地后便将毒品“坐”下来。常有“坐者”因中途不适引起疾病而死亡。万全县烟贩子薛××从1941年起，勾结北平土商，在乡间私收烟土，并在当地加工成“料面”后，常年雇用坐男坐女35人，来往于张家口和北平间，1942年一年时间，走私毒品达24860两。

毒品的泛滥，必然造成“瘾君子”的大量出现。张家口市区“40年代初有吸毒者1753人，遍及全市，多数集中在桥东花园街、居安里、高安里、西太平街一带。那时，在张家口市街头巷尾，经常看到吸毒者尸体”。1942年，蒙疆新闻社作过一次调查，张市吸毒成瘾者有5480人；“由于日本人强令种烟和大量出售鸦片烟，崇礼（张家口市郊）全县几乎有钱人吸，没钱人自种自吸，绝大多数家庭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第293页。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引自《六年来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2辑，第216页。
《六年之蒙疆》，蒙疆新闻社编。

都有吸毒人。全县粗略统计,吸毒成瘾者七八千人”。在包头、萨拉齐、固阳一带,几乎“家家有烟枪,户户有烟鬼,每到夜晚烟味溢于户外,咯吱吱控烟斗之声不绝于耳”。

嗜毒成瘾不仅损害了人的健康,更使不少人精神颓废,愿作亡国奴。李守信的材料供认:日本在蒙疆广种鸦片,让许多人染上吸毒的嗜好,因烟瘾作祟,许多纵有爱国心的人,也不愿到解放区过艰苦生活。那时在北平的许多胡同里,那些新油漆的街门,差不多都是伪蒙疆团长、县长们的房子。他们靠走私毒品发了财,买了房子,这是甘当汉奸,不愿反正的重要原因。

对于大多数嗜毒者来说,等待他们的是家破人亡横尸街头的下场。塞外红极一时的晋剧名伶毛毛旦,艺技高超,当地传说“三天三夜不吃饭,也要去听毛毛旦”。然而此人自1940年吸毒之后,起初是不吸烟不能上台,后来变为吸了烟也不能上台,慢慢地变成不食不喝只吸烟。最后抛尸于张家口的一个烟馆内。万全县白××自幼靠寡母抚养大,自1942年吸烟之后,第一年不能下地,便卖房子作烟钱,最后逼着老母去第7村当佣人,以换来一口“活命烟”。这样的事例在蒙疆经常发生。当地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抽大烟,抽筋抽血在面前,卖田卖房卖老婆,卖了孩子卖亲娘。这便是烟祸毒害之一端。

五 日本投降后肃清烟祸的斗争

日本制造的蒙疆烟祸,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为第二次

《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2辑,第216页。

《东河文史》第3辑,第48页。

李守信:《日寇统治内蒙的策略》,《内蒙古文史资料选编》第20辑,第169页。

姜济民:《日本在“蒙疆”地区建立鸦片生产基地》,《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6辑,第253页。

王金诚:《万全县鸦片毒害始末》,《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2辑,第226页。

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之一，1948年东京国际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提出鸦片毒品犯罪的指控并最后宣判决。东京国际法庭1948年6月的判决书指出：日本在中国占领期间公布了鸦片法（即鸦片政策），这些法律炮制了由日伪政府统治的专卖机关，向经日伪政府批准的商店配给鸦片毒品。这些专卖机关为了由毒品中增加收入，不过是为了鼓励毒品的大量销售而设立的征税机构。

判决书同时指出了日本鸦片政策的政治和军事之目的：“毒品的买卖，是与日军的军事占领行为和政治发展需要相联系的。由于毒品的买卖使日本获得了为设置占领区的军事及各种地方政权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

判决书还指出了兴亚院在制定和推行蒙疆鸦片政策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在东京兴亚院所掌管的事项中就有鸦片一项。兴亚院研究中国各地的需要状况，规划办理鸦片，自蒙古分配到华北、华中及华南各地的工作。”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最后指出：由日本控制和鼓励的傀儡蒙疆政权，是日本占领区中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和毒品的主要供应者。

应该指出的是，在25名被远东国际法庭判罪的日本战犯中，没有一名是蒙疆烟祸的直接主持决策人物。而那些制定和推行对蒙疆的鸦片侵略政策的人当时就在日本国内，他们之中至今仍有人健在。由于这些负有直接罪行者者的逃脱，造成了策划蒙疆烟祸的那些深层次的问题至今仍很不清楚。

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押了一批侵华期间推行鸦片侵略政策或直接犯有走私、倒卖毒品的日本战犯。从1956年6月6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对他们进

〔日〕江口圭一：《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近代史资料》，总86期，第228页。
同上。

行审判。对关押在山西太原战犯监狱的原蒙疆地区的日本战犯人员首先进行审判,有关他们的鸦片毒品犯罪事实如下:大矢正春,1941年倒卖烟土1600两;田川胜三,贩卖毒品15磅;丸田春市,贩卖毒品18磅;中岛孝子,贩运海洛因3次,共3040两;石川大郎,贩运毒品32件,5232两;栗田保,贩运毒品320两;洼田制定,掠夺烟土800两;贩卖海洛因120磅;横尾直治,多次贩卖毒品,约250磅,并包庇毒犯。以上鸦片毒品罪犯由于他们在押期间认罪态度好,所以被免于起诉,经宣判后全部释放回国。

1956年7月1日至20日,特别军事法庭第二次开庭,在沈阳公开宣判28名在押的日本战犯。其中包括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两人,他们对中国东北和蒙疆推行鸦片侵略政策,负有主要责任。特别军事法庭对武部六藏的鸦片罪提出的指控如下:被告人在任伪满州国总务长官期间,继续推行鸦片专卖政策,强迫我国东北人民栽种罂粟,大量推销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榨取中国财富。1942年8月,被告人派总务厅参事宫琦诚等人到东京参加由兴亚院主持的“支那鸦片需供会议”。被告人从1943年开始,又策划鸦片增产计划,扩大种植罂粟区域,进一步泛滥烟毒,残害中国人民健康……对古海忠之的指控是:被告人自1935年10月至1940年5月,任伪满主计处处长期间,亲自掌管编制鸦片专卖预算、决算制度,1941年11月被告人任伪满总务次长后,又参与“火曜会”,参与策划、推行鸦片增长计划,扩大种植罂粟面积,强迫东北人民栽种。大量制造、推销毒品,泛滥烟毒。被告人并且亲自去上海、南京推销毒品……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武部六藏有期徒刑20年,古海忠之有期徒刑18年。

两次历史性的审判,从法律上宣判了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侵略的罪行。然而为肃清烟祸恶果,包括恢复严禁鸦片法规,打击毒

《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最高法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05页。

行审判。对关押在山西太原战犯监狱的原蒙疆地区的日本战犯人员首先进行审判,有关他们的鸦片毒品犯罪事实如下:大矢正春,1941年倒卖烟土1600两;田川胜三,贩卖毒品15磅;丸田春市,贩卖毒品18磅;中岛孝子,贩运海洛因3次,共3040两;石川大郎,贩运毒品32件,5232两;栗田保,贩运毒品320两;洼田制定,掠夺烟土800两;贩卖海洛因120磅;横尾直治,多次贩卖毒品,约250磅,并包庇毒犯。以上鸦片毒品罪犯由于他们在押期间认罪态度好,所以被免于起诉,经宣判后全部释放回国。

1956年7月1日至20日,特别军事法庭第二次开庭,在沈阳公开宣判28名在押的日本战犯。其中包括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两人,他们对中国东北和蒙疆推行鸦片侵略政策,负有主要责任。特别军事法庭对武部六藏的鸦片罪提出的指控如下:被告人在任伪满州国总务长官期间,继续推行鸦片专卖政策,强迫我国东北人民栽种罂粟,大量推销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榨取中国财富。1942年8月,被告人派总务厅参事宫琦诚等人到东京参加由兴亚院主持的“支那鸦片需供会议”。被告人从1943年开始,又策划鸦片增产计划,扩大种植罂粟区域,进一步泛滥烟毒,残害中国人民健康……对古海忠之的指控是:被告人自1935年10月至1940年5月,任伪满主计处处长期间,亲自掌管编制鸦片专卖预算、决算制度,1941年11月被告人任伪满总务次长后,又参与“火曜会”,参与策划、推行鸦片增长计划,扩大种植罂粟面积,强迫东北人民栽种。大量制造、推销毒品,泛滥烟毒。被告人并且亲自去上海、南京推销毒品……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武部六藏有期徒刑20年,古海忠之有期徒刑18年。

两次历史性的审判,从法律上宣判了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侵略的罪行。然而为肃清烟祸恶果,包括恢复严禁鸦片法规,打击毒

《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最高法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05页。